

春蚕奶奶与保姆



92岁的孙世英老人每天都会读书看报。

孙世英家宽敞的客厅几乎被记者挤满了。他们扛着摄像机、举着录音笔，记录下这位92岁老太太的一举一动。

记者们是被这样一则社区新闻吸引来的：从1985年至今，孙世英前后雇用了20位保姆，她帮助其中的几位学习了从解剖生理、内分泌知识到英语、缝纫、财会等技能。从农村来到城市打工、出入孙家的这些小保姆，如今有人成了月薪近万元的“金牌月嫂”，有人当上初中英语教师，还有人成为企业会计，走上了自己过去未曾预料的道路。

在新闻里，人们称孙世英为“春蚕奶奶”，她还登上了一家电视台的“好人榜”。可满头银发的老人觉得，自己只是做了些再平常不过的事。“她们到我家里都是十几岁的小姑娘，如果不是家境不好，也不会这么早就离开父母和学校。如果她们渴望改变自己的命运，我愿意帮助她们。”

“这些小姑娘就像我的孙女一样”

“春蚕奶奶”如今与女儿、女婿一起住在北京北四环外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里。由于女儿坚持做“丁克”，这个三口之家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70岁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孙世英从郑州铁路中心医院妇产科离休。那时她居住在郑州，常年被心脏病、高血压等疾病困扰，于是家里开始请保姆。

从那时到现在，时间已经过去20多年，孙世英家也先后换过将近20位保姆。但只要她们在这里工作上几个月，这位曾经中风、患过乳腺癌的老人总能记得住她们每一个人的名字，甚至还保留着其中一些女孩的照片。

“安芳、艾菊、凤如、邦燕、小荷……”她伸出生满皱纹的手指，一个个数着说：“我家里人不多，儿子一家移民美国，所以这些小姑娘就像我的孙女一样。”

当年18岁的河南姑娘安芳是这家的第一个保姆。在老太太看来，她虽然已经初中毕业，却对继续学习文化兴趣不大。不过，孙世英也发现，安芳喜欢做缝缝补补的活儿，于是干脆在60元工资的基础上，又每月补贴她15元去缝缝学校学习。

艾菊则是个爱学习的姑娘，并且特别喜欢学英语。曾经在教会学校读书的孙世英帮她买了录音机，教她口语，甚至主动对艾菊说：“那我们就开始conversation(对话)吧！”后来，艾菊继续读了中专、大专，在河南一所中学当上了英文教师。

不过，最令老人唏嘘的还是凤如。凤如的母亲是续弦，她在家有几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。7岁时，父亲去世，母女俩就过得更多余了。她仅仅读到小学二年级就被迫辍学，不久便进城打工。在老人家里的日子，或许是女孩生命里的一段悠闲时光。那时孙世英和老伴儿的生活都可以自理，凤如只需要做些简单的家务活儿，每个月能赚上80元。日子久了，孙世英发现凤如连日常汉字也认不全，就教她识字、写字，再教她写信的格式。

过去“半文盲”的女孩，开始兴高采烈地写信回农村，问母亲“现在过得好不好”。

但时间不长，她的嫂子生了小孩，哥哥叫她回去帮忙照顾。临走时，孙奶奶送给她一件呢子外套，而她抱着奶奶的肩膀痛哭。

“那孩子太苦了。”坐在家里的木椅上，佝偻着背的老人回忆道，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她曾收到过一封凤如写来的信，这个识字不多的女孩在信里写道：“我很痛苦。”

孙世英给凤如的哥哥打了一个长途电话：“在我这里可是有工资的，回家你好歹也要给她点儿零用钱吧。”

但她并不知道自己的电话是否起到作用。老人后来搬到北京与女儿同住，变了邮寄地址，她再也不能收到凤如以往每年都会寄来的贺卡了。

“我和她有话聊，待在一起话就多”

如今，在孙世英家里，31岁的张崇是刚刚来了两个多月的保姆。事实上，这是她在结婚后第一次出门到外地打工，第一次走进北京。

在这个巨大的城市里，短发、微胖、不爱与外人交谈的张崇是极为不起眼的一个人。她是被“换过来的”。过去，她的丈夫在南方一座城市开公交车，收入还不错。但这两年，丈夫被查出患有恶性肿瘤，他只能回到河南驻马店市的农村老家照顾两个孩子，并让妻子外出打工。说到自己家里的状况时，她双手交叠着放在膝盖上，神色平静得像是谈论别人的故事。

但孙世英知道，张崇希望能多赚点钱，就像曾经在这家里待过几年的小保姆邦燕一样——她如今已是“金牌月嫂”，中学老师，会计出纳……一个个专做家务的保姆转身成为有职业素养的人才。老人不求回报的感人精神荡涤着人们的心灵，网友亲切地称其为“春蚕奶奶”。

春蚕奶奶

在北京，一位叫孙世英的92岁老人，在过去27年里，付出相当的金钱和时间，为进出自家的十余位保姆铺筑成才路。金牌月嫂，中学老师，会计出纳……一个个专做家务的保姆转身成为有职业素养的人才。老人不求回报的感人精神荡涤着人们的心灵，网友亲切地称其为“春蚕奶奶”。

如今回忆起那段故事时，老人记得这主要是由于邦燕曾经向她诉苦：“在农村，有病了都不知道怎么办。”可在邦燕看来，自己当时可没有一丁点想要学“解剖生理”的意思，甚至恰恰相反，“开始我太没兴趣了，我又不当医生，学这个干什么？”

可时间毕竟是空下来了，邦燕想着，“反正又没事，学点知识也好。”

每个星期总有两个下午，这一老一少就坐在客厅的餐桌上学习。尽管是“业余学校”，可孙世英毫不放松课堂上的要求，唯一的学生每堂课都得做笔记，下节课开始前要先通过测验，直



孙世英为保姆示范如何给婴儿洗澡。

到“好了，这个课过关了”，才算结束。

“刚开始硬着头皮”的学生渐渐从这门课里找到了乐趣。一个孕妇来家里做客时，孙世英拿出听诊器帮孕妇检查，还让一旁的邦燕也实践了一把。那是她第一次听到胎心，“觉得太好了”。

邦燕并不知道，这些当时看来好像不太用得上的知识，在她未来的生活中起到了关键作用。

老太太想给她介绍对象。邦燕的身高成了难题，先后3个男人都不同意。孙家一个亲戚家的司机，尽管个子也不高，却道：“我这么矮，可得找个高的。”第4个人最终成为邦燕的丈夫。那个身高1.8米的男人，他的表哥与孙世英的女儿是同学，他也十几岁就来到城市打工，家庭条件不算太好。

1999年，他们结婚。酒席只有一桌，是孙世英和家人帮着置办的。邦燕在城里的亲戚只有一个表妹，孙奶奶家算是“娘家人”。老人还将自己摸彩票时中得的一台25英寸彩电作为嫁妆。

“我这儿离不开你。你都结婚了，也不能把你绑在这儿。”孙世英这样想着，终于与陪伴了自己好几年的“孙女”告别了。邦燕生下一个女儿后，就在北京做起了月嫂。目前，她的月工资已经涨到了9000多元。

每当提到邦燕，老人骄傲的神情就像是说自己的孩子：“她现在每个月的工资很高的！”不过，她又心疼地补充了一句，“听说晚上常常不能睡觉，实在是太辛苦了。”

至于邦燕，她今年已经40岁了，却仍时常给老人打电话，向她请教产妇产后怎么护理，也帮她排解心情的郁闷。她说：“奶奶对我的改变，太大了。”

有人问起孙世英，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帮助家里的小保姆。老人则会提起一个20年前的故事。邦燕刚到她家的时候，就因为心脏病住进武警总医院。尽管病房里还有一张空床，但邦燕却整夜未睡，盘腿坐在床沿，目不转睛地盯着老人。她不知道什么是心脏病，也不知道这种病该怎么护理，但她“就是觉得害怕，就怕睡着了听不见你叫人”。

“她是用心对我好啊。”老人拍了拍自己的胸口说道。

“人跟人应该平等”

有关“春蚕奶奶”和保姆们的故事，实际上是在一本名叫《历程》的书里被找到的。这是孙世英老人90岁那年写的自传，讲述了她和丈夫一生的故事。

在这本书里，与保姆相关的内容仅占其中的半页。老人写道：“我认为青年的女孩，初中文化，工作不易……

来做家庭服务……我能培养帮助她们也是应该的。”她猜想，或许是由于将书送给了自己所在的党支部，支部成员发现了这其中特别的一段并通知了记者，才使她受到媒体关注。

尽管帮助保姆的故事仅占其中极小的一部分，可孙世英却觉得，正是那本书中叙述的生活和经历，让自己成了保姆们如今面对的这样一个

来。她1921年出生于江苏徐州，祖母家经营银楼，是徐州城的第二大富商。父亲曾参加北伐战争，任职团长，后又在徐州任过盐务局督察队长和税务局长，“都是肥官”。因此，孙世英从小读幼儿园、教会学校、高级助产学校，接受了良好的教育。

丈夫刘琦行与她青梅竹马。刘父是黄炎培的同学，曾任国民党苏浙皖监察使、南京教育局局长。刘母1909年就加入同盟会，以后以“革命元老”的身份当选为国民党的国大代表。

这样的两家人，或许很难想象，自己的儿女居然加入了中共地下党。他们在南京举行婚礼时，后来在台湾出任“总统府秘书长”的国民党元老张群前去道贺，李宗仁、宋美龄也专程派代表前往。正当这些国民党大人物走进一楼大厅的婚宴时，地下室却正在二楼孙世英的新娘梳妆室里召开秘密会议。后来，刘琦行与父亲背道而驰，加入共产党的消息，甚至还曾登上多家报纸。

为了躲避蒋介石政府的迫害，这对年轻的夫妻曾躲去香港。1949年，他们乘船北上，回到北京。

如今，人们带着对“春蚕奶奶”故

这段经历，在谈话中很少提到“保姆”两个字，有时干脆就用“这一行”来代替。小荷承认，自己“从上学的时候就对这一行有抵触”。仅有小学学历的堂妹也在做保姆，这或许是她抵触的原因之一。

一天，她走在街上，被塞了一张补习班的传单。看看里面的科目，她觉得“会计班”看着挺不错。回到家，孙奶奶也鼓励她的选择，还亲自送她去报名。她一边在奶奶家打工，一边在学校上课，坚持了一年多，又考了专业证书。接着，她就彻底离开“这一行”，在北京的一家公司里当上了会计。

在小荷看来，“奶奶是个典型的好人”。直到现在她仍每周都去看奶奶，帮她家里交电费、开通网络，也向她倾诉自己心中的苦闷。她有时还会带着男朋友一起回去，却不说自己在这家里做过保姆，而是称呼老人的女儿为“干妈”。

她还是没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

活。她后来发现，自己其实不喜欢会计这份工作，每月工资3000多元，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生活艰难。小荷拒绝与记者见面，在电话里，她的声音听上去仍旧充满迷茫：“这就是安顿我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有时很难过，想回家，但又不甘愿回去。”

月嫂邦燕则算是在城里站稳了脚跟。她的收入可观，丈夫也在一家小区物业公司找到了比较稳定的保安工作。这个爱笑的女人如今身份证上的名字“帮艳”并不怎么喜欢，在介绍自己时，她会郑重其事地说：“我的名字是安邦定国的邦，燕子的燕。”

看上去生活正在朝着更好的方向



4月12日，孙世英老人用婴儿模型教现在的保姆如何护理婴儿。

事的好奇走进这个家庭，才得知了更多传奇的往事。老先生刘琦行在几年前去世了。娇滴滴的千金大小姐为宣传抗日一天走60里路以至于抱着脚痛哭的日子，已经过去了大半个世纪。如今出门已经需要坐轮椅的老太太，还是会时常将话题说回到那些过去的时光。

她说，自己一生为人受到两个人的影响。一位是她的祖母，那是个善良的前清夫人，如果有乞丐来家里讨饭，这位女主人都会亲自将好饭菜送到乞丐面前。而另一位，则是她的“老乡”周恩来，“他是个无儿无女却毫不自私的人”。

“人跟人应该平等。”孙世英说，这是她参加革命后一直坚持到今天的经营理念。

在谈起为什么要尽心力培养家中的保姆时，孙世英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那些小姑娘十七八岁就出来打工了，要是我的孩子17岁时，我可宝贝她。”

直到几次聊天后，她才告诉记者，自己的孩子在那个年岁，正值“文革”时，她被迫离开来看，关在一个学习班里，由6个年轻人看守。每天晚上200瓦的灯泡亮着悬在头顶，令她无法入睡。老地下党员刘琦行每次送饭时，都将一小张透明纸包成团放进饭盒一角，纸上有时写着“一定要坚持说实话，不要怕威逼”，有时写着“说实话吃好吃好”。

“那些看管我的青年们，她们哪有这种做地下工作的经验。”老人在自传里这样写道。只是，由于这场家庭变故，她的孩子大病一场。

“我有时很难过，想回家，但又不甘愿回去”

并不是每一个保姆都愿意学些什么。孙世英把来家里工作的保姆归纳为3种：有些年轻人学习能力强，“我愿意培训她，也不耽误什么事”；有些中年人，可以学营养知识和膳食搭配；还有些人对学习没兴趣，也就“从她”。

她常说，自己是个“脾气不太好，要求比较高”的人。在她家里，门把手必须每天消毒，回答问题不能用模棱两可的“可能，差不多”，只能说“是”或“不是”。2005年，只有20岁的小荷(化名)从甘肃老家的电脑学校中专毕业后来到北京。她找不到与自己专业有关的工作，只好想着“先到自己专业干一下”。就这样，她在孙世英家做了两年多的保姆。

直到今天，她都不愿意提起自己

这段经历，在谈话中很少提到“保姆”两个字，有时干脆就用“这一行”来代替。小荷承认，自己“从上学的时候就对这一行有抵触”。仅有小学学历的堂妹也在做保姆，这或许是她抵触的原因之一。

一天，她走在街上，被塞了一张补习班的传单。看看里面的科目，她觉得“会计班”看着挺不错。回到家，孙奶奶也鼓励她的选择，还亲自送她去报名。她一边在奶奶家打工，一边在学校上课，坚持了一年多，又考了专业证书。接着，她就彻底离开“这一行”，在北京的一家公司里当上了会计。

在小荷看来，“奶奶是个典型的好人”。直到现在她仍每周都去看奶奶，帮她家里交电费、开通网络，也向她倾诉自己心中的苦闷。她有时还会带着男朋友一起回去，却不说自己在这家里做过保姆，而是称呼老人的女儿为“干妈”。

她还是没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

活。她后来发现，自己其实不喜欢会计这份工作，每月工资3000多元，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生活艰难。小荷拒绝与记者见面，在电话里，她的声音听上去仍旧充满迷茫：“这就是安顿我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有时很难过，想回家，但又不甘愿回去。”

月嫂邦燕则算是在城里站稳了脚跟。她的收入可观，丈夫也在一家小区物业公司找到了比较稳定的保安工作。这个爱笑的女人如今身份证上的名字“帮艳”并不怎么喜欢，在介绍自己时，她会郑重其事地说：“我的名字是安邦定国的邦，燕子的燕。”

看上去生活正在朝着更好的方向



其实就在孙世英老人的家里，也并非没有雇主与保姆间的矛盾。这里有过一个“流兮兮”的保姆，“脾气坏得很”，喝骂了老人从美国回来的孙子。“我老了，也不想听她大声说话。”孙世英说。另一个保姆，丈夫赌钱，又有婚外情，她便每天像“发疯了”一样。有时，老人托保姆去买一盒华素片，那人便会偷偷地从盒里拿一块药藏起来。这样的小问题积多了，老人最后只好把她们辞退。但无论如何，如果对方便回老家，她总是会为她们买好回程的火车票。

有时，老太太会想起小萍。为了900元彩礼钱，这个女孩9岁就被父亲订了人家。“那么小的孩子订个什么婚！”孙世英听说此事后气恼极了。她告诉小萍，赚到钱千万不能乱花，一定要赶快把彩礼钱攒出来还上。

小萍也是一个小学都没怎么上就外出打工的女孩。在孙奶奶身边，她学会了使用计算器，也学习识字。后来她每天都能写上六七百字的日记，记录自己“每天做点什么想点什么”。

可有一天，小萍出去逛街买衣服，突然慌里慌张地跑回家。“奶奶，我拿了人家一件衣服。”她嗔嗔着告诉老人。孙世英简直不敢相信小萍会做出这样的事来，她让女孩马上把衣服还回去，可女孩哭着拒绝：“我不能还，还了他们会叫警察抓我的。”

没过多久，小萍离开了这个家。临行时，她将自己写的一本日记送给了奶奶。

所有这些不尽如人意的往事，并没有让“春蚕奶奶”怀疑自己最初的想法，她仍认为，“女孩们本来有改变命运的机会，我把她们拴在身边，就是害人家嘛”。就像如今在她身边工作的张崇，丈夫生了重病，老太太无微不至地希望她能像邦燕一样做月嫂，多赚些钱。

前不久的一天，张崇用轮椅推着她到市场，她买回一个“长手长脚的青蛙玩偶”。回到家，孙世英将玩偶用作“教学器械”，“你看，洗澡时要轻轻地按住宝宝的耳朵。”她开始一丝不苟地给保姆演示，如何“将掌虎口环于后脑勺，拇指和中指按住宝宝的耳朵”。

也许过了没多久，张崇也会借助她培训的力量，走向更远的地方。“有时候，雇保姆雇得伤心极了，我家都成了培训所了。”这个看上去有些衰弱的老人叹了口气，但随即又高兴起来，“她们从我这里出去，大都把这儿当成家，时常会跑回来找我。我多了很多‘孙女’，这是福气啊。”

(据《中国青年报》文/赵涵溪)



在孙世英的帮助下，保姆邦燕考取了月嫂职业培训师证书。